

中国故事

当阳光照进柴房 《宣言》响彻东方 (报告文学)

徐锦庚

1920年2月中旬。这天黄昏,一条杭州来的客货混装船,沿着浦阳江溯流而上,缓缓靠上黄宅码头。一个身手敏捷的年轻人,身子一纵,从船上跳下。年轻人身着长衫,留着三七分头,眉间开阔,眼眶凹陷,鼻梁坚挺,嘴唇棱角分明,手拎一只旧皮箱。皮箱有些分量,年轻人换了一只手,撩起长衫前摆,掖在腰间,迈开步伐,朝山谷快步行走。夕阳下,两侧群山一阴一阳,阴面深黛,阳面金黄。山这边,是浦江县城。山那边,是义乌县。他的家乡分水塘,就在半山腰的堰口。这位年轻人,便是陈望道。

自我革命

一别经年,陈望道发现,家乡虽然年味浓浓,却掩不住暮气沉沉,乡亲们眼睛浑浊空洞,举止缓慢迟滞。是生活粗陋所致?还是世道暗无天日,让他们看不到希望?陈望道心里沉甸甸的。大半年前,有感于国内局势混乱、国民沉沦,他激愤写下《扰乱与进化》,发表在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学灯”上。此时,他想,《扰乱与进化》写的,虽是泛泛国民,何尝不是写自己父母,还有分水塘的父老乡亲?看来,国家的命运,分水塘的命运,是与泱泱中国的命运系在一起的。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?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,陈望道念念不忘社会改造,在《校友会十日刊》撰文,呼吁废除旧制度,改换新制度。没想到,有朝一日,这事儿会落到自家头上。

这天上午,陈望道正在收拾行李箱,有人在门外喊:“重阳伯在吗?”乡亲们把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尊称为“重阳伯”。陈望道走出房门,见是一个小老头,扶着一把锄头,倚在大门上,朝里面探头探脑,一看到他,满脸绽出笑容:“哟,是参一啊,多年没见,还这么白白净净。”陈望道原名参一,在日本留学时改的名。

小老头皮肤黝黑,满脸皱纹,约莫五十开外。陈望道觉得面熟,一时想不起来,只好茫然应着:“进屋坐坐吧。”“不了,站着就行。”小老头有些拘谨,“不认识了?我是先塘的张水财呀。”

“哎呀,是水财哥啊,快快进来!”陈望道跨前一步,要拉张水财的手,张水财慌忙后退一步,摆摆手,“不了,不了,我还要去干活,说几句话就走。”

先塘村是陈望道外婆家,张水财比陈望道略大几岁。陈望道去外婆家玩时,常跟着他上树摘果,下河摸鱼。一晃几年不见,才30出头的张水财竟老得不敢认了。

陈望道一把拽住张水财胳膊,用力握住他的手,这才发现,他手掌像钢铁。

张水财赶紧抽出手:“我手上净是灰,别弄脏了你。”陈望道毫不介意,问道:“水财哥,你没外出做生意?”“做啥生意……”张水财讪讪地笑着,有些不自在,“我是你家的佃户。”

“啊?!”陈望道大吃一惊,“你自家不是有田吗?怎么成我家佃户了?”“唉!”张水财长叹一声,“前几年,为给我爸妈治病,把田都卖了。”“这样啊?”陈望道十分关切,“老人家治好了?”

“唉!都走了。”张水财又长叹一声,“我是人财两空,只好租你家的田。”陈望道默然片刻,忽然想起:“你找我爸有事?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水财挠挠头,面露难色,“我家孩子多,日子本来就紧巴巴。前些天,县里来征丁,不去当兵的,要交丁税,我家只我一个壮劳力,离不开,只能交税。今年年成不好,稻谷歉收,这一交,谷桶就见底了,只够勉强过个年。所以,想来向重阳伯求个情,能不能减租。”

陈望道急忙问:“你要交多少税?”张水财苦着脸:“要交三成田租。”

陈望道心里一沉。自古以来,村里就有规矩,租佃三七分,东家得七分,佃户得三分。佃户粮食本来就不多,再交征丁税,无异于雪上加霜。想不到,苛捐杂税这么多,乡亲们活得这么苦,怪不得衰老得快!他问道:“你想减多少?”

“我和几个佃户商量过了,想求重阳伯减两成,这样勉强能挨到夏

收。他们抹不开面子,托我来求情。”张水财说。

“走,我领你去找我爸。”陈望道说罢,转身在前面走。

祠堂里,陈君元正同几位宗亲议事,看到陈望道走进来,就说:“参一啊,我们正商量祭祖的事呢,你来得正好,给出个主意。”

陈望道朝几位长辈道一声安,垂手对父亲说:“爸,水财哥有事求您。”

张水财碎步趋前,低声下气地说明来意。

陈君元吸着烟,眯着眼,没吭声。“减租?”一位长辈接过话茬,“我家的佃户也说要减租,我没答应。交税是按收成定的,我家交的税更多,如果再减租,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啊?”

“我家佃户也提了,我也没答应。”旁边一位长辈附和。

“小户人家底薄,经不起折腾。大户人家底厚,省着点就过去了。”陈望道人朝着父亲,话说给几位长辈听。

“什么话!”一位长辈不乐意了,“小家有小家的难,大家也有大家的难。自古以来,这租田交租,天经地义。租不起,可以不租嘛。”

陈望道微微一笑,不紧不慢,递上一顶高帽子:“我问过了,以前年成不好时,老辈人也给佃户减过租。几位长辈都是善人,向来慈悲为怀、怜贫惜弱,老辈人的这份善心,想必也传承下来了。”

听了此话,几位长辈面面相觑,一时语塞。

沉默一会儿,一位长辈瞪陈君元一眼,踢过皮球:“重阳哪,你是族长,这破规矩的事,还得你拿主意。凡事得讲个理儿,讲个公平,对吧?七里八乡,户看户,村看村,都盯着呢,不能光拍脑袋,要看看左邻右舍。不然的话,一碗水没端平,别人会戳脊梁骨。”

陈望道听出话里有话,接过话头:“爸,三伯说得对。这是积德行善的事,如果见危不助、见死不救,别人会戳脊梁骨的。”

三伯一听着急了,赶紧说: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陈望道打断他的话:“三伯深明大义,教导得对,我记住了。谁家没个急事难事?我们应该互帮互助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不能光顾自己吃肉,也要让别人喝点汤。今后,我要向各位长辈学习,多帮帮别人,多积德行善。”

三伯干咳一声,尴尬地笑笑:“参一啊,你这这一声墨水没白喝,我说不不过你。还是让你爸拿主意吧。”

“是,是。三伯说得是,听我爸的。”陈望道就坡下驴,对着父亲,“爸,您呢?”

陈君元白了儿子一眼,拔出烟嘴,沉吟片刻,说:“是啊,大家说得都在理。小家有小家的难,大家也有大家的难,凡事要讲个公平。我看,要不就折中一下,减一成,行不?”

几位宗亲对视了一下,不情愿地点点头:“好吧。这已经不少了。”

“爸,您看……”陈望道有些失望。陈君元手一举,阻止儿子往下说,转向张水财:“你看呢?这样行不?”

“欸,欸!好好,我就去告诉他们。”张水财哈着腰,转身欲走。

“等等。”陈君元想了想,补了一句,“你家人口多,如果粮食不够,我给你啥些,明年再扣。”

“欸,欸!那敢情好。这个年,我可以过安安稳稳了!”张水财大喜过望,朝陈君元鞠了一躬,扛起锄头,乐颠颠走了。

待几位宗亲走后,陈君元朝儿子狠狠瞪一眼:“哼,这几天,整天听你说这革命,那革命。这下倒好,先举起老子的命来了!今后,家里的亏空,你给填上!”说罢,一跺脚,背着手,气呼呼地往家走。

“是,是,我来填,我来填!”陈望道吐一下舌头,连忙跟上。

寒夜孤灯

庚申春节过后,陈望道惦记着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事。

陈望道留日回国后,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。因“一师风波”,年前愤然离开杭州,去了上海。那力

子把他介绍给戴季陶,戴季陶又引他见了陈独秀。俩人郑重托付他翻译此书。戴季陶说:“别看这么薄薄一本,要准确翻译,难度不小。你试译一下,译成后,我就在《星期评论》上连载。”

要翻译,得找个僻静地方。哪里合适呢?他转悠到柴房,眼睛一亮,腾出一块空地,摆上两条长凳,搁块木板当桌。

吃过晚饭,陈望道来到柴房,点上一盏煤油灯。漆黑的小屋,霎时光亮起来。他把英日版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和参考资料摆在案板上。

煤油灯光昏黄摇曳,陈望道摊开两个译本。虽然他中文功底深厚,兼修英文和日文,留日期间大量接触社会主义,但细细研读后,仍感到十分棘手。这时,他才理解,为什么戴季陶说请他“试译”。

开宗明义第一句,就让陈望道颇费踌躇。他在纸上写了划,划了写,绞尽脑汁,反复修改,最后敲定为:“有一个怪物,在欧洲徘徊着,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。”

油灯下的陈望道,并没有意识到,他郑重写下的这句话,在民众心里回荡了数十年!直到22年后,在延安窑洞的另一盏油灯下,共产党的理论家博古反复推敲,才将“怪物”改为“幽灵”,把“徘徊”改作“游荡”。

日译本中的汉字词汇,陈望道没有完全照搬。最明显的,是对国名的翻译。日译本中,国名采取音译,这是旧式译法,他采用现代的国家名称。有一个国名,日译本称“和兰”。开始,他译作“荷兰”,但对照英译本,发觉不对。反复琢磨后,他得出结论:日译本译错了,正确的国名应是“丹麦”。

得益于深厚的中文功底,陈望道注重在韵律节奏、直白易懂、生动形象上下功夫。如“同业组合”“佣雇职工”,他换成简短的“行东”“佣工”;“阵营”“渣滓”“革命要素”,他换成形象的“营寨”“赘疣”“革命种子”。这么一换,想象力和理解力大增。一些原本抽象难记的词,如“生产机关”“社会组织”“农业的革命”,他换成具象易懂的“生产工具”“社会的状况”“土地革命”,既易懂,又易记。特别是“土地革命”,此概念融入《共产党宣言》思想后,使《共产党宣言》犹如教科书,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,产生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,影响广泛而深远。

为了体现鲜明的立场,使《共产党宣言》更具号召力、战斗力,他还增加一些更为尖锐的词汇,体现更为激烈的斗争立场。如,表示两种阶级对立状态时,日译本用的是“相敌视”,他改为“对垒”。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状况时,日译本用的是“没落”,他换成“倾覆”。

此时,天已大亮。晨风中,飘来一阵炊烟味,肚子受不住诱惑,“咕咕”叫起来。他贪婪地吸了几口,端坐下来,添水研墨,轻蘸墨汁,静心屏息,笔下行云流水。

“吱呀。”门开了,母亲张翠娟拎着篮子进来,取出粽子、红糖,摆在案桌上。

陈望道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只,张嘴往里塞。张翠娟心疼地说:“慢点,蘸着糖吃,别噎着。”

过了一会,她在门外轻声问:“红糖够不?”

屋里回答:“够了,够了!”又过一会儿,张翠娟探头进来,小心问:“甜不?”

张翠娟近前一看,红糖好好的,感到奇怪:“咦,咋没蘸红糖?”

陈望道抬起头来。儿子这一抬头,把母亲吓得不轻,连退两步:“你嘴上黑乎乎的,啥东西?”

“没啥呀。”陈望道抹了一把嘴,“噢,怎么尽是墨汁?”低头一看,不由得哈哈大笑。原来,自己稀里糊涂,竟然蘸着墨汁吃粽子!

“你呀,着魔了!”母亲又好气,又好笑。

转眼到4月底。这天上午,当一缕阳光投射进柴房时,陈望道搁下笔,长吁一口气:终于完成了!

《共产党宣言》问世时,马克思30岁,恩格斯28岁。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时,比马克思小1岁,比恩格斯大1岁。

错印封面

一天傍晚,陈家正在吃晚饭,门外有人喊:“陈先生,陈先生,有你的电报!”

电报是星期评论杂志社发来的,邀请陈望道去担任编辑。他带上译稿,告别家人,兴冲冲赶往上海,直奔星期评论杂志社。

陈望道正欲上楼,忽然传来男人哭声。三楼阳台上,围坐着5人,哭者正是戴季陶,另外4人在劝慰。有俩人他见过,叫李汉俊、沈玄庐,是杂志社主力。另俩人,一位面庞瘦削,梳着背头,一位戴副眼镜,剃着光头。戴季陶止住哭,介绍了一番。原来是沈雁冰、李达。

坐下后,陈望道才知原委。原来,《星期评论》创刊一年来,刊登了不少观点激进的文章,社会各界反响热烈,发行量有十几万份。当局十分忌惮,截留各地寄给编辑部的书信信件,又没收编辑部寄出的杂志。自47期以后,当局干脆勒令禁止。他们正在商量,打算出满53期后,6月6日停刊。

陈望道四下打量,过道上,角落里,堆满《星期评论》旧刊。他忽然想起来,打开皮箱,取出厚厚一沓稿纸,“糟糕,我的译稿咋办?”

“本来是要在刊物上连载。现在看来,连载是不可能了。”戴季陶接过来,浏览了一遍,露出赞许神情,“译得很好!刊物没能连载,真是可惜了。”

李汉俊读过大量马克思原著,深知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重要性,曾当过翻译念头,自付中文功底不够而作罢,听说陈望道翻译好了,十分吃惊,接过来,边看边叫好。

陈望道没赶上编辑刊物,却赶上给刊物收摊子,帮着李汉俊,把杂志拿到街上,避开警察,悄悄分发给市民。待收拾妥当,已是6月27日。

杂志社编辑俞秀松,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。晚上,陈望道找到他,把《共产党宣言》译稿和日、英文译本交给他,托他带给陈独秀,请陈独秀校阅把关。

俞秀松不敢怠慢,第二天上午,来到陈独秀寓所,将译稿郑重交给陈独秀。

陈独秀看罢译稿,连连称好: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础薄弱,没有本像样的理论书指导,怎么办?这译稿可是及时雨啊!”

他找到李汉俊:“陈望道立了大功,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翻译出来了,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好好看看,帮忙润色润色。”

李汉俊说:“我已经先睹为快了,只是不知如何处理。别看这本书字数不多,翻译难度可不小,有很多新名词,我自感力所不逮,不敢动手。望道了不起!”

“是啊,有志者,事竟成。”陈独秀感慨不已:“你尚且知难而退,望道不事张扬,却终成大事,就更值得钦佩了。你多费点心,帮他把关。”

对陈望道的才学修养,陈独秀大为赞叹。此时,新青年杂志社正需要编辑,他觉得陈望道堪担重任,便邀请陈望道担任。



陈望道(1891—1977),浙江义乌人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,著名教育家、语言学家。早年求学于金华中学、之江大学。1915年赴日本留学。1919年夏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,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。1920年翻译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。在复旦大学任教近五十年,1952年任复旦大学校长至去世。郭红松绘

《共产党宣言》传播年表

1847年12月至1848年2月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比利时撰写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(德文),并于1848年2月1日完稿。

1848年2月

英国伦敦“工人教育协会”首次匿名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德文全文单行本,全书共23页。4至5月,德文再版30页本在伦敦刊行,成为后来各版本的基础。

1872年6月

新的德文版在莱比锡出版,马克思、恩格斯合写了序言。此版本及其后版本都以《共产主义宣言》为名。

1905年底

朱执信(署名仲伟)在《民报》第二号上发表《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》一文,第一次简要介绍《宣言》的写作背景、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。

1919年4月

李大钊、陈独秀主编《每周评论》第十六号“著”专栏内刊登成舍我译《宣言》第二章最后部分及十条纲领全文。

1920年

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将《宣言》全译为中文。同年8月,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初版刊行。9月,该社再版,纠正了初版封面的错误。

1921年7月

中国共产党成立。

1930年

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英文版据英文翻译的英汉对照本,第一次准确译出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!”

1936年

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,有3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其中一本便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1938年8月

成仿吾与徐冰在延安据德文版翻译《宣言》,由延安解放社出版。

1943年8月

博古在成、徐译本基础上参照1939年俄文版加以校订,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译本并在各根据地发行。

1958年至今

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对《宣言》进行重新译校,陆续出版多个中文译本。